



COURAGE and CONSEQUENCE

My Life as a Conservative in the Fight

《纽约时报》畅销书

我的奋斗人生

布什的“大脑” 从地下室走向白宫

卡尔·罗夫自传

[美] 卡尔·罗夫 (Karl Rove) 著 先洋洋 译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COURAGE and CONSEQUENCE

My Life as a Conservative in the Fight

我的奋斗人生

卡尔·罗夫自传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奋斗人生:卡尔·罗夫自传/(美)罗夫
(Karl Rove, K.)著;先洋洋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12

书名原文: Courage and Consequence

ISBN 978 - 7 - 5118 - 1529 - 3

I. ①我… II. ①罗…②先… III. ①罗夫, K. —自
传 IV. ①K837. 1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9805 号

我的奋斗人生:卡尔·罗夫自传

卡尔·罗夫(Karl Rove)著
先洋洋译

责任编辑 韩满春
装帧设计 清 杨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版本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廊坊市飞腾彩印制版公司

印张 26.25 字数 460 千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独立策划部·麒麟工作室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吕亚莉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1529 - 3

定价:5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序 言

通往历史之路

2001年9月11日,我第一个告诉布什总统有飞机撞到了纽约的一栋办公大楼,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同他一起待在来回穿梭的空军一号上。我亲历了历史,霎时间发生的事远远超出了像我一样出身的人的想象。对美国 and 总统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我那时在空军一号上以及后来在白宫所看到的人们的勇气与信念,使我坚信在这场斗争中我站在了正确的一边。

政治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竞技活动,事实也确实如此。然而对于细节的过分关注使得政治之所以重要的初始理由变得模糊:政治为美国人民选择以谁的理念来治国,并为这些理念怎样改变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竞技场。有着坚定信念的领导人往往能决定最后的竞技结果。

政治是高压、高风险且常常令人心灰意冷的。但政治也充满了喜悦、兴奋和胜利,于我而言,2001年1月20日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刻:这一天,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我带夫人达比(Darby)到白宫参观我在西翼的新办公室。靠近大楼时,我吃了一惊:一位海军士兵突然立正并为我们开了门。我踌躇了一下。我想:要走进这扇门吗?然后我走了进去——我成了历史的见证人。

这是新一届总统任期的开始,也是我政治生涯的一个里程碑。这一路上,有着我把自己当局外人的时刻——就像我在1978年退出了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初期的总统竞选时那样;也有着充满了幸运或者是惊奇的时刻——比如在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某天我试着敲了敲门,结果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穿着袒胸露肩的睡袍出现在我眼前,并邀请我进了她家。

也有充满着冒险、巨大压力以及危险的时刻。在家里的办公桌上,我保留着一份简报,上面有张照片——欧文·路易斯·斯科特·利比(I. Lewis

“Scooter” Libby)和他妻子的一幅图片。利比曾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的办公室主任。2005年10月28日,在联邦大陪审团就妨碍调查、向联邦调查局探员撒谎和向一个大陪审团作伪证对利比提起诉讼时,他的政治生涯也跟着结束了。

我保留着这份简报一方面是为了提醒自己政治是多么的残酷,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报道了一个广为人知却又被广泛误解的事件。政治上的分歧引发了对利比的起诉,并演变为一场法律斗争。对我而言,成为司法调查的对象是一个悲惨的经历。然而,人们就布什总统任期内的中心问题——伊拉克战争是否正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那些激烈争论相比,我的经历实在不值一提。

我的办公地离总统办公室只有15步远。从这一有利位置出发,本书将澄清一些是非。我的白宫之路以及白宫岁月,就此拉开帷幕。我会承认一些错误,也会毫不避讳地为一些有争议的决定提供有力的理由,但我不会对此表达丝毫歉意。

我真想知道自己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小时候,我对于我们的政治体系并不着迷。其实很多孩童都是如此。我的家族中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能使我自然地走到历史的前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家人们在西落基山脉间颠簸,生活水平在中产阶级中也稍显偏下。我的父亲是一位地质学家,每次因公出差都是好几个月。上大学的时候,我没有地方可住,然而幸运的是我在联谊会会堂的门廊上找到了一个不是特别热的贮藏室。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

然而它确是很恰当的一个。早年生活会塑造一个人的人生观。我在成长中树立了西部价值观:即使是在生活受到束缚的情况下,也要努力寻找各种机会。我早年的经历使我成为一个保守派,它引领我走向共和党,同时也使我相信自己能为作为民主生命线的党派斗争做出一些贡献。

接下来,我会讲述我的生命轨迹,解释自己改弦易辙的原因,描述一个从破裂家庭走出来的孩子,是如何使那位以勇气与信念带领国家挺过多事之秋的保守派总统称赞他为“建筑师”的。

目 录

- 序言 通往历史之路 / 1
- 第一章 西线一个破裂的家庭 / 1
- 第二章 大学共和党之王 / 19
- 第三章 植根德克萨斯 / 37
- 第四章 什么是罗夫式竞选? / 53
- 第五章 征服德克萨斯 / 65
- 第六章 新任州长 / 80
- 第七章 白宫的微光 / 91
- 第八章 大计划 / 99
- 第九章 折戟新罕布什尔,重生南卡罗来纳 / 110
- 第十章 大事件 / 126
- 第十一章 选择切尼 / 134
- 第十二章 酒后驾驶,脱轨 / 143
- 第十三章 地狱般的三十六天 / 163
- 第十四章 真实的西翼 / 176
- 第十五章 大想法 / 189
- 第十六章 9·11 / 201

- 第十七章 世贸大厦遗址 / 216
- 第十八章 反击 / 229
- 第十九章 什么样的两党合作? / 244
- 第二十章 乔·威尔逊之袭 / 254
- 第二十一章 在伊拉克问题上布什是正确的 / 264
- 第二十二章 特别检察官和我 / 274
- 第二十三章 迎战克里 / 288
- 第二十四章 医疗与婚姻 / 296
- 第二十五章 为克里设陷,与麦凯恩和解 / 301
- 第二十六章 悬念和胜利 / 308
- 第二十七章 毫无约束的民主党人 / 321
- 第二十八章 全力而战 / 337
- 第二十九章 卡特里娜飓风 / 351
- 第三十章 奔波的共和党人 / 364
- 第三十一章 增兵 / 373
- 第三十二章 是的,这很好笑 / 384
- 第三十三章 离开白宫 / 390
- 第三十四章 罗夫之谜 / 398
- 后记 / 408

第一章

西线一个破裂的家庭

您听过这样一个笑话吗？说有个挪威人非常爱自己的老婆以至于他差点就要表达出自己对她的爱意了。我的父亲，小路易斯·罗夫（Louis C. Rove, Jr.），正是挪威人，是千千万万沉默寡言的居民中的一员，他们有太多的东西没有说出口。但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开始敞开心扉，向我们讲述他自己的经历、婚姻和我的童年。他开始同我及我的妻子达比接触。我们在圣达非（Santa Fe）一起看歌剧、参加夏天的室内音乐节；在探索新墨西哥（New Mexico）的时候，他也会透露一些关于我们家庭生活的非常私人的秘密。我在这里揭露这些是因为我童年的情况几乎与此南辕北辙。况且要想澄清一些事情，有些东西就必须得说，尤其是当它牵涉到你的家人时。

因此，在我开始讲述我的政治生涯前，我想谈谈关于我的家庭的真实故事，一个充满了爱与悲伤的故事。我的父亲是一个地质学家，约六英尺高，留着短短的褐色头发，戴着一副眼镜，着装整齐，他有着一种和蔼而忧郁的风格。父亲生于威斯康星州（Wisconsin），曾在海军服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兵役，那时“二战”也差不多快结束了。后来，他在密歇根（Michigan）的霍普学院（Hope College）待了一年。在他的叔叔奥拉夫·罗夫（Olaf Rove）（此人是一位有名的地质学家的顾问）的激励下，父亲转到了位于果登市（Golden）的科罗拉多矿业大学（Colorado School of Mines）。

在那里，父亲邂逅了我的母亲丽芭·伍德（Reba Wood）。他们有着太多的不同点。父亲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博学之人，在一个充满书香气息、古典乐熏陶以及歌剧陶冶的理性家庭中长大。而母亲既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接触过书籍或古典音乐，并且也不感兴趣。还好母亲是她那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唯一的女孩，否则又将有一个我所不知的童年悲剧。不管怎样，她常表现得很坚

强,似乎一切都尽在指掌,然而事实上她却很脆弱。她的脆弱、情绪化以及痛苦大多数人都看不到。然而她与父亲却彼此吸引着:父亲痴迷于她的美貌与激情,她则钟情于父亲的稳重可依以及华丽的外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非常恩爱。

母亲是罗伯特(Robert G.)和埃尔西·伍德(Elsie Wood)唯一的女儿,她有三个兄弟。我的外祖父没上过大学,然而却充满了激情、梦想,并且很诚实。在大萧条期间,他在科罗拉多州的一个公路部门工作。后来,他开始出售他在寄售处购买的屠宰刀——那些刀就放在他的汽车后座上的一个木架上进行销售,之后他在科罗拉多州南部一个偏僻的地方开了一家杂货店。外祖父最终将其发展为一项事业——罗伯特·伍德公司,“有质量的屠夫供货商”。这为伍德家族三代人提供了优质的生活。我在外祖父位于丹佛(Denver)的店铺里同他和三个舅舅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

我的外祖父母在他们成年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丹佛的洛厄尔林荫大道3045号的房子中。他们唯一的奢侈就是去旅行——这些都被外祖父录入了一部原始的电影摄影机。二十年间,他们去过墨西哥,到过南美,飞过夏威夷;在中东局势不那么紧张的时候,他们还去游览过黎巴嫩、以色列以及埃及;也在柬埔寨和越南变得危险以前去过那边;还到过从前的日本。在他们每次旅行回来后,我都去观看外祖父拍摄的录像,听他在一旁讲解,那真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外祖母用旅行中买回来的物件将房间装点得非常可人:其中有小装饰品,有吴哥窟(Angkor Wat)带回来的拓片,也有秘鲁村庄中的祭坛装饰品。

在外祖父因心脏病逝于1974年的劳动节之后,外祖母试图自杀,她枪击自己的胃部,然而自杀未遂。她在痛苦和孤独中又活了25年,哀悼她的丈夫。我后来发现,她间接地向心爱的人展示了自杀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处理痛苦的方式。

我于1950年圣诞节的早上出生于科罗拉多州丹佛一家医院的电梯里。我猜想我是急于想要起航。我成长于一个有教养的中下层家庭,是家中的老二。我们家有五个孩子:三个男孩两个女孩,男孩中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我弟弟;两个女孩都是我的妹妹。我们一直在科罗拉多住到我九岁,之后搬到内华达州(Nevada)的斯帕克斯(Sparks),直到我15岁;再后来为了父亲的探矿事业,我们全家搬到了犹他州(Utah)的霍拉迪(Holladay)。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专门从事铀、铅、锌、铜的地质学研究的年轻人并没有什么大收益,然而这一行当的要求却很高。父亲常常一走就是几个月,去安哥拉(Angola)或者莫桑比克(Mozambique)、阿鲁巴岛(Aruba)、亚伯达

(Alberta)的马尼托巴湖(Manitoba)、加拿大的夏洛特皇后岛(Queen Charlotte Islands)、阿拉斯加(Alaska)以及西部其他地势较低的48个州。父亲的旅程促成了一个孩子对旗帜学的兴趣:我常常画他走过的各个国家和州的旗帜,并且非常珍视他给我的一本关于各国旗帜以及历史的书。

我还保留着一张父亲站在桌旁书架边的照片,这张照片摄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早期安哥拉一个偏远的地区。他被一些粗野的孩子环绕着——那些孩子可能没什么机会见到西方人。在我年幼那会儿,这张照片中的父亲于我而言就是一个年轻的被晒黑的半神。事实上,那时他刚从学校毕业,正在试图规划自己的人生。

我们几个孩子听着与非洲有关的故事长大,听父亲讲他后来死于里斯本(Lisbon)动物园的爱猴齐科(Chico),以及他怎样获得了一张八英尺长的蛇皮、一张斑马皮和一个犀牛角——这些东西在我们家里被尊为神圣的图腾。我们会通过一些盛大的仪式将它们展示给朋友看。

在科罗拉多,我和家人先在科科莫(Kokomo)的公司城镇短暂地住过一段时间,那地方离莱德维尔(Leadville)的克莱马克斯(Climax)矿较近。接着我们又搬到了阿瓦达(Arvida)以外一个大牧场中的一所房子里。这个地方的东南角有一个很大的池塘,周围环绕着一条壕沟。那里成了我们游戏和探险的最佳领域。

我们有一个鸡笼和一个菜园,这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很需要的鸡蛋、胡萝卜、番茄以及绿豆。直到现在,我仍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从菜园里摘取新鲜的草莓更有趣;没有什么能比茄子更糟糕,尤其是前一天晚上炸的没有吃完而第二天又被拿出来作早餐的冷茄子。

我们从来不缺什么必需品,但是我们的家庭预算总是很紧张。母亲可能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不懂理财的人,常常花很多的钱做很少的事。然而值得赞扬的是,她总是尝试着挣钱,不过她的想法往往只能持续一两个季度。有一年,我们收集松果并将其卖给当地的托儿所。后来母亲成了雅芳小姐,于是我和我的兄弟(最终动员了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了装袋方面的专家,我们依编码按顺序把货物装袋打包。所有不同颜色的雅芳唇膏的代码我都烂熟于心。此外我们也送过报,给人割过草,为邻居们的小孩作过临时保姆,卖过柠檬水,也曾在外祖父的商店里帮忙。在我的花样年华里,我在餐桌边伺候过客人,在一家出售广藿香精油的嬉皮店里作过收银员,在医院当过厨师,在一家便利店值过夜班。在我被抢劫了两次以后(第一次对方用的是手枪,第二次则是散弹枪),父母让我辞了那份工作。被抢的时候,我表现得很冷静,事后才开始害怕并对父母坚持让我辞掉那份工作感到很欣慰。

在我们年轻那会儿，即使我们如此努力，钱却总是不够用。在我五岁那年的圣诞节，父亲本该领到的红利变成了一份小小的津贴，因此他便没钱给大伙儿买礼物了。于是父亲去找了一位开直升飞机的好朋友。之后他的朋友就像电视剧《风流医生俏护士》(M * A * S * H)里边出现的画面那样，开着飞机降落到我们家附近满是灰尘的牧场里，将我们带上了云霄。父亲解释说这是圣诞老人的直升机，所以我们只能在圣诞节之前乘着它旅行。迄今为止，那仍是我过得最好的一次圣诞节。

对于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来讲，我们的童年充满了田园诗意。我们和童子军、少年棒球联合会的孩子们一起玩，在附近的田野里“战斗”、收集邮票和硬币、交换棒球卡片；周日在祖父母家里吃炸鸡，用他们的彩色电视观看《伯纳德》(Bonanza)和《迪斯尼奇妙世界》(The Wonderful World of Disney)。我很尊敬我的哥哥埃里克(Eric)，尽管他常常痛打我——这一点同所有担任哥哥这一角色的人一样。埃里克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公路建设的行列，通常都在户外。阿尔玛(Alma)小我六岁，她是我们中最像母亲的一个，并且经历了比母亲更多的不幸。奥拉夫(Olaf)比我小八岁，是一个知足常乐的孩子，长大后成了一个计算机专家。小我九岁的丽芭(Reba)尤其聪明、自律、幽默，也爱玩把戏——至少在提到自己的童年经历时，她的言语中充满了善意的夸大。我们是一群外向而活跃的人。

在我们搬到内华达之前，家里是没有电视的。父亲说不买电视是为了让我们多读书，锻炼脑力以及完成家庭作业。我猜想家庭经济不很乐观也同样是我们没有电视的原因之一。父亲在家的時候，会给我们读书，或让我们听由德士古赞助的歌剧并为我们解释听到的故事，所以有没有电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放假的时候，父亲会在附近有地质作业的时候把我们也带去。这培养了我们对于西部的广阔天地以及大自然的热爱。父亲的频繁旅行及我们常常搬家这一事实使得我很自然地成了一个外向者，很会与人交友联络——当然这也是必需的。我生活在一个整洁的中产家庭，家中只有少量然而却很精致的家具及艺术品，这些都使得我对物质没有过多的渴望。

父亲不在的时候，就由母亲主持家务，她可以交替地扮演海军魔鬼士官长和温柔体贴的角色。母亲的性情不是很稳定，然而对音乐剧的喜爱却是一如既往。整个家庭常常濒临险境。母亲有时会遭遇一些危机，她于是同孩子们分享她的恐惧。事情过去以后，她会将其放下，可是我们却仍然被焦虑和不确定所围绕。我的父亲和祖父协助组织了科罗拉多州的戈登第一长老教会(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 of Golden, Colorado)，那里也有周日学校和教会夏

令营。多年后,负责讲道的牧师告诉我,他和我父亲当时参加了当地的一个长老会集会,在那里一个牧师的小女儿每次都为大家弹奏钢琴助兴。那小女孩就是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她的父亲约翰是丹佛的蒙特维尤长老教会(Montview Presbyterian Church)的副本堂神父。我的父母后来又积极地帮助筹备位于斯帕克斯的威斯敏斯特长老教会(Westminster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parks),我被迫成了一名游说者,接下来又成了接待员。我们常常能瞥见生活的残酷,尤其是在我九岁那年搬到内华达以后。有时邻居家的小孩会突然到我家蹭晚饭,同我们一起吃意大利面条、通心粉或者蘸着奶酪的肉汉堡。我明白,这些孩子的父母往往是把薪水都赌输得精光的那种。这些经历使我这一生都对赌博充满了厌恶。

因为父亲常不在家,母亲又有行为异常的倾向,于是我只好从书中去寻求安慰。书籍可信、可靠,可以让人兴奋地逃往一个更好的地方。“没有一艘快船能像一本书那样,载着我们游历他乡,”艾米莉·迪金森(Emily Dickinson)曾写道。我并不擅长体育运动,我的家庭也承担不起娱乐的费用,因此书籍便成了我的救星:你们可以将我对政治的热爱以及职业生涯归咎于书籍的作用。

我仍记得第一本为我提供精神护卫的书,那是我二年级的老师送给我的礼物:《历史上的伟大瞬间》。这本书讲述了《独立宣言》、《宪法》、《阿拉莫之战》以及让我着迷的美国内战。我会阅读所有我能得到的书,但尤其偏爱传记和历史。1960年美国内战百年纪念的那一年,我七岁,接触到了许许多多这一话题的书。

对我而言,内战不仅是有趣而激动人心的,它更是真实的。它是由很多真实的人们用真实的生活拼成的戏剧,这些人的选择决定了年轻的民主党是否能保持住林肯所说的“带着最美好的希望实现最后的自由”。我仔细地读那些关于内战的图画书,有时甚至临摹一些战时画作,比如《弗兰克·莱斯利插图画报》(*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或者《哈泼斯》上的作品,这些图片后来又载入了弗莱切·普拉特(Fletcher Pratt)的《内战》一书中。《美国图片遗产之内战历史地图》尤其令我着迷。那些图片描述了一些小分队在战场上的情况:北方军与南方军总是在布尔溪(Bull Run)、斯波特瑟尔维尼亚(Spotsylvania)、葛底斯堡(Gettysburg)、维克斯堡(Vicksburg)、亚特兰大(Atlanta)、彼得斯堡(Petersburg)以及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迎面相冲。

我对政治的热爱以及后来加入了共和党的原因并不是完全归功于对书籍的热爱。我的父母对政治都不怎么感兴趣。母亲在1970年投了共和党一票是因为那时我正为大佬党工作;然而1972年她投了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领导的和平和自由党,因为那会儿我的兄弟在支持该党。

共和党的纲领同我的成长背景很相称。我在西部的落基山脉地区长大，那里视野开阔，更重要的是，该地盛行自由主义。西部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和个人责任，我觉得这些价值被共和党人很好地诠释。在西部，人们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功绩，而不是他的出身。

九岁那年，我决定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中支持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我将尼克松用于竞选的车尾贴广告贴在了自行车的篮筐上，骑着车往返于街道间，以为那就可以为他赢得一些选票。然而这事却引来了一个住在附近的小女孩的注意。她年纪比我长，大约比我重30磅，并且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狂热支持者。她将我 from 自行车上拖下来并且彻底打败了我：我的鼻子同自尊心一起在滴血。此后，我再也没有在什么政治斗争中败得像那天一样惨。

十三岁那年，我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而疯狂。我喜欢他的人生观：注重自由、责任、尊严、个体的价值；强调了政府介入的危害以及政治对于保护这些理想的重要性。我有戈德华特纽扣、贴纸和海报，也有戈德华特的书《一个保守派的良知》——皱皱的平装本；我还有一个印有戈德华特姓氏的闪闪发亮的铝合金罐，那是专门为竞选活动制作的手工艺品。我将一个戈德华特的标牌放在前院里，不过不久它就消失了。我不知道是我父母还是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的支持者移走了它。约翰逊不仅征服了亚利桑那州参议院，也冲击了我。我感到很绝望。然而对于像我一样处于萌芽阶段的小共和党人来讲，戈德华特虽败犹荣。他是在战斗中败下来的，他已经很好地阐释了他的政治理想，没有退让。戈德华特是一个有信念的政治家，能改变世界的那种。

经济学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进入了我的视野——有人送了我一本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弗里德曼是资本主义最坚决的维护者和代言人之一。他在书中写道：“政府权力必须分散。如果政府要行使权力，那么在郡行使好过在州际，州际则又优于华府。”弗里德曼激起了我的兴趣，于是我随后又读了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大头针制造者、劳动分工以及“无形的手”——所有这些对我来讲都很有意义。

接下来是小威廉·弗兰克·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内华达州斯帕克斯的图书馆订阅了巴克利创办的《国民评论》，这本杂志的封面很朴实，观念却大胆。我每周都急切地盼望着杂志的到来，虽然文章中很多词我不认识，比如denouement(结局)，但是我常常能猜出它们的意思。我对巴克利的书爱不释手。十五岁那年，我读他的《失败的市长竞选》，从开篇一直笑到

结尾。

当我在四年级还是五年级第一次上公民学课程的时候,其他同学以“我们的宪法”或者“国会”为题写第一学期的论文,而我则写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因为那时我刚好读了卡尔·马克思的作品。但是,我想要寻到一座桥梁,将我从思想世界带到政治实践——于是在15岁那年,我寻到了在政府的第一份工作。

我在初中及高中的暑假都在内华达里诺的华秀郡(Washoe County)办公室实习。那年夏天伊始,我们家从史派克搬到了犹他州的霍拉迪,与盐湖城(Salt Lake City)相距不远。我留了下来,同我的童子军队长和他夫人住在一起,那个夏天,我乘着公共汽车去县政府工作,之后回住所,如此反复。不知为何,在书记办公室整理和影印文件都让我觉得刺激和新鲜。行政管理的过程是令人兴奋的。我大多数时候是整理一些关于犯罪或者离婚的文件,但也观摩了一些审判、参与了一些县郡委员会会议,甚至在税章审查委员会做过客——尽管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在谈些什么,只知道和钱与税收有关。我对县郡管理异常着迷,为了解县郡治理中的深奥理论,我开始阅读所有我能找到的相关书籍。

夏天结束时,给我留下了一个令人兴奋的社会印记。在我实习的最后一天,十八岁的可爱职员让我送她回家。在她公寓外面,她给了我一个快吻。但在一个街区之外,最后一班从里诺驶回史派克的车正很快地靠近站台,所以我只能同她说再见并且飞速赶去乘车。

1966年秋,我们在霍拉迪一处简陋的房子里安了家,我入了盐湖城郊外的奥林匹斯中学,感觉很失落。因为我不认识任何人。在一个摩门教徒占到90%甚至更高的学校里,不信该教的我是个异类。我没有体育特长,也不善于讨女孩子欢心。但我也有一项技能:我善于演讲与辩论。我很幸运,因为在奥林匹斯的某些地方以及犹他州的大部分地区,中学辩论都很受重视,在辩论里,书呆子也能得到肯定。我加入了辩论队,找到了我的同族,那种失落感消失了。

辩论队的教练戴安娜·蔡尔兹(Diana Childs)将我和马克·丹杰菲尔德(Mark Dangerfield)编为一组。马克长我一岁,我们一拍即合。他有着灿烂的微笑,头脑敏锐,很有竞争意识,有能力磨平我的棱角。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之处。

例如,我们都很看重准备的充分性。我们的研究工作比所有竞争对手做得都好——这个习惯我一直保留至今。我们在四乘六英寸的卡片上花了很多钱,我们在卡片上用一丝不苟的印刷体字母写上我们收集到的信息,有时也用

那个我们在二手交易中得到的小巧的手动打字机把信息打上去。接着我们小心翼翼地将卡片排列到有隔段的大盒子里，这样我们便能快速地找到事例、格言和权威论据。我发明了一种精巧的配色方案，能让我们在特定的时刻取出正确的卡片挫败对方辩手。

在高中的辩论里，辩手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准备好正反两方的问题。于是我们常常抛开自己的论点，参与到对手的论点中，之后又抛开这个论点。在辩论开始前我尽可能地多练习，对于政治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辩论让我养成了同时检验我方的参选人和对手的习惯。在选战中，你不仅要考虑当下想说什么，并且要想到辩论的列车（甚至是事件）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终结。辩论也教会了我保持进攻的重要性，一旦你转入了防守，将很难再得到谈话的控制权。

本着对研究的热爱，马克和我想出了一个很好的策略。我们引用对方辩手闻所未闻的权威人物的言论，当他们质疑我们所引言论的出处时，我们就会展开所引人物的令人震撼的头衔，比如“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然后再佯装惊讶，笑话我们可敬的对手们竟从来没有听过这一重要的政治领袖。

辩论在中学教室里举行，通常是在演讲、历史学或者国际事务课之前。观众都是很有耐心的，他们对我们讲的东西并不感兴趣，然而却乖乖地坐在椅凳上听着三件套里骨瘦如柴的我们辩论。如果我们让他们笑了或者有了积极的回应，那种喜悦同我们在裁判的积分表上拿到分值一样令人欣慰。我们小组成了州内中学演讲和辩论的冠军，还胜过一场重要的西部区域的比赛。

其他一些活动也从辩论中衍生了出来。我加入了犹他州大型的组织之一——模拟联合国，并最终成了模拟联合国俱乐部的主席。我参加了一些演讲比赛，比如国外战争的老兵组织的“民主之声”以及美国军人学会的“美国精神”演讲比赛。这类比赛中，学生们就指定的题目向作为听众的退伍军人发表关于爱国主义的演讲。我赢得了很多场比赛，甚至还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默塞德（Merced）参加过一场西部区域的比赛。

辩论不是唯一一件在高中时代扩展了我的视野的事。我的政治远景也即将展开。在这一点上给我启蒙的是我的中学老师埃尔登·托尔曼（Eldon M. Tolman）。他身材矮小，喜欢整洁，常戴着眼镜和蝶形领结。他跟我很不一样，是我不喜欢的类型——包括他是民主党人，而且是林登·贝恩斯·约翰逊那一类。托尔曼还是一名工会官员，犹他州教育联盟当地分会的主席。如果说我从戈德华特那里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便是：不要相信工会首领。

但是这些差异在托尔曼热爱政治以及希望他的学生们也热爱政治的事实之下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值得嘉许的是，他并不在意学生们的看法是什么，而

且很幸运的是，他在1968年成为我的老师，确保我赶上了那一年的所有大事件。然而他也曾把我拉到一边用一本正经而又恰如其分的语气对我说，如果我想得优，就必须参与一场政治竞选。那时，我有五英尺稍多一点那么高，戴着厚框眼镜，穿着暇步士，挎着一个公文包。对我来说这意义重大。

我选择支持的竞选人物是犹他州年长的美国参议员华莱士·福斯特·贝内特(Wallace F. Bennett)。贝内特那时已经七十岁了，是在我出生那年被选进参议院的。一个性急而又具有超凡魅力的年轻的犹他大学教授威廉姆斯(J. D. Williams)则在竞争民主党提名。人们对于越战的愤怒开始升温，很多年轻人聚到一起支持反战的诸如威廉斯等候选人。我知道的是，贝内特支持越战；不知道的是，他当时正计划着在年轻人身上下大力气以中和掉民主党的吸引力。

渐渐地我成了盐湖郡中学支持贝内特的学生中的主席。我劝诱朋友们来做志愿者，分发竞选贴纸，在指挥部工作，招募有着相似想法的带着政治狂热的年轻人把竞选标志放到庭院里并参与竞选活动。我们的人并不多，所以我常常逼迫我的弟弟妹妹们也参与到服务中来。

同时，托尔曼决定于春天在奥林匹斯举行一场模拟会议让学生们进行总统提名。我竭尽全力帮助大佬党一方的组织。成百上千的学生们扮演了州代表以及政党领袖的角色。像真正的共和党全国大会一样，我们提名了理查德·尼克松。我们在竞选总部来回执行任务，在纽扣、横幅上刻痕，用熏肠装扮学校的自助餐厅，以用于我们的模拟会议。然而，我们对于尼克松的提名，是在我们完成这些工作以后作出的。

托尔曼先生最大的贡献便是确保了每个学生都见到所有到镇上来的总统候选人。今天我们很难想象犹他州是一个摇摆州，然而在1968年，情况确实是这样。那一年三个主要的候选人——尼克松、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都来过盐湖城的摩门大会堂，我也见到了他们。

华莱士易怒、好战、肮脏，甚至连不是专家的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十足的蛊惑民心的政客。有一位反对者在华莱士演说时想让他难堪，问了一些刁钻的问题，但这位阿拉巴马州的州长却反过来讥讽那位反对者，说如果这个反对者在他的豪华轿车前躺下，他将会是最后一个为此躺下的人。人群于是欢呼，以表赞同。当这个阿拉巴马州的矮脚公鸡大摇大摆地走上摩门大会堂的台阶时，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一个偏执狂以及他所激起的种族仇恨。事实上我感到害怕：他热烈的演说老到而有力，在人群中激起了愤怒的尖叫。这些民众对自己的国家感到愤慨，而华莱士来了个火上浇油。

尼克松很优雅，做事谨慎，对公众承诺要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体：既是那年最有希望在选战中获胜的政客，同时又明显是最不满意自己候选人身份的人。他依靠自己意志的力量走到了当时的位置。副总统汉弗莱给我的印象则是常常紧张不安，并且很落伍。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和蔼的贵族，他在启动他的竞选总部时显露出的和气和友好，丝毫没有掺杂任何做作的成分。他同样也有很多颇具水准的宣传材料。罗伯特·肯尼迪在人群中激起狂怒，然而他自己却显得清醒、冷漠而疲倦。他能在鼓舞人心的同时令人感到悲痛。而在罗纳德·里根的演讲之后，尖叫和欢呼声是我所见过的最热烈的。在市中心的一个公园里，反战的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的演讲则显得冷漠而缺乏热情。

那一年是美国政治史上罕有的、有纪念意义并且影响深远的一年，我之所以能够近距离亲睹那一幕幕，要归功于一位热爱政治也热爱学生的自由派老师。我被永久性地征服了。甚至我自己也成了候选人。事实上，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聪慧的竞选经理（我的世界历史老师）选择了一个菜鸟候选人（我），通过一场聪明的竞选活动，最终赢得了胜利。

她坚持要我竞选学生会的第二副主席，虽然我的书呆子朋友们数量上并不足以选出任何人。然而她招募了高年级的篮球队队长以及广受欢迎的有着崭新黄色跑车的高年级女孩联合主持我的竞选活动。有了这种人物的支持，还有一个强大的发起人机敏的幕后操作，我的信誉度陡然上升。这下万事俱备了。

奥林匹斯的学生们通过两个方面来判定一个候选人是否有资格进驻学生会办公室。首先是候选人挂在走廊上的宣传海报的质量。我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学美术的，他帮我设计了海报，辩论队的朋友们帮忙做出了很多实物，他们从杂志上剪下精美的贴图，然后涂上光亮的虫漆，这些宣传海报便愈发显得突出了。大部分的海报都是诙谐、淫秽、引人注目的。有会玩文字游戏的朋友帮忙，便有了意料之外的好处。我仅记得一张海报是通过效仿一则有名的汽车广告，来鼓动学生们“支持小布吕泰（Mini - Brute）”。我很自信我们拥有最好的海报——但仅靠这些就足够了么？

第二个对候选人的测验便是幽默故事和演讲水平。我的对手约翰曾凭借一个完整尺寸的硬纸箱，把自己置身其内，从屋外滚进体育馆。然后，以他那室外的假衣柜为开场白开始了他的演讲，最后当选了高二和高三的学生主席。（你们现在清楚约翰这个人了吧？）这一招管用两次，我们也准确地预料到他将会再沿用这一战略。学生们已经看过了这一幕，因此它的新鲜感已经消失殆尽了。然而我们却带给了大伙儿一个惊喜：当音响系统里传出我的名字